

20SHIJI XUESHUDASHI JIAOWANG XILIE

WENTANSHILINFENGYULU
GUOMORUOJIAOWANGDEWENHUAQUAN

20世纪学术大师交往系列

郭沫若与鲁迅：现代中国文学的双子星座

郭沫若与茅盾：『肝胆相对共筹量』

郭沫若与郁达夫：『二十余年如一日』

郭沫若与傅抱石：交相辉映诗画魂

郭沫若与胡适：他们曾经是朋友

郭沫若与陈寅恪：『龙虎斗』与『马牛风』

郭沫若与容庚：由『未知友』到『文字交』

郭沫若与刘大年：新中国『翰林院』一页

《文坛史林风雨路》林甘泉 主编

文坛史林风雨路

——郭沫若交往的文化圈

林甘泉 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世纪学术大师交往系列

文坛史林风雨路

——郭沫若交往的文化圈

林甘泉 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史林风雨路:郭沫若交往的文化圈/林甘泉主编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0
(20世纪学术大师交往系列)
ISBN 7-213-01811-6

I.文… II.林… III.郭沫若-生平事迹
IV.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7690 号

文坛史林风雨路

——郭沫若交往的文化圈

林甘泉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陈巧丽 吴晓红
封面设计 池长尧
责任校对 李育智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杭州玉古路 20 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33 万 插 页 2
印 数 1-4000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811-6/K·454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代序：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①

林甘泉

一部文化史，就其重要层面而言，可以说是由众多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的活动及其文化遗产构成的。这些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之间的交往，也是他们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之间的友情、论争和恩怨，不仅透露了各个人不同的性格、气质和价值取向，而且往往能够反映出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文化动向。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诗人和作家，又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著的史学大师。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生涯中，他结识的文化名人可以开出一个很长的名单。在这个文化圈里，既有他的同辈，也有他的前辈和晚辈；既有他的同志和战友，也有敌对营垒中人，还有超然于党派斗争之外的人士；既有数十年如一日的旧雨相知，也有一般的文字之交或工作同事。就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想而言，既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也有扞格不合，乃至互为论敌者。总之，这个文化圈的成员各有成就，颇具特色，堪称 20 世纪中国富有代表性的一群文化精英。他们和郭沫若一起，共同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许多璀璨篇章。

人际关系归根到底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表面上看来似乎完

① 《诗经·小雅·伐木》。

全是个人行为，其实不能不受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郭沫若与文化界的交往，如果撇开少年时代不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14年至1924年是第一时期；1924年至1937年是第二时期；1937年至1949年是第三时期；1949年建国以后至他生命终止是第四时期。这四个时期在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变动和政治风云，不仅在郭沫若的人生道路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且对他的人际交往也有重大影响。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试图围绕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文艺界和史学界若干名人的交往，勾画出他人生道路的某些轨迹。希望读者从中对郭沫若的思想和性格能有更多的认识，而且对了解这半个多世纪文坛史林的风风雨雨也能有所帮助。

一、寻找“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屈指韶华二十年，茫茫心绪总如烟。故人相对无长物，一弹剑缺一呼天。”^①这是郭沫若学生时代与同学灯前对酒，促膝谈心，醉后所写的一首诗。它反映了作者对朋友的真挚深情和不甘于无所作为的抱负。走出夔门到日本留学之后，他很快就找到了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一批情投意合的朋友。那个时候的一些知识青年，不但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而且都有一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郭沫若也不例外。但如果对比一下郭沫若和鲁迅从学医转而从事文学创作的直接动机，却是很能说明他们早年思想性格的差异的。鲁迅曾经说，有一回他在教师放映的幻灯片上，看到日俄战争时一个中国人被日军砍下头颅示众，而周围观看的中国人却显出麻木的神情。这对鲁迅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使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

^① 《郭沫若少年诗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郭沫若说他从小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但出国后“却存心要克服他”,因为那时“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他之所以对文学又发生兴趣,是“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的作品接近了”。后来到福冈学医,为了学德语,读歌德的作品,“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②。可见郭沫若最初选择文学创作的道路,并不存在什么经世致用的考虑,而是由自己的兴趣和性情所决定的。

郭沫若开始尝试写白话诗时,深受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由诗那种豪放风格的影响。而帮助他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是当时《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的编辑宗白华。郭沫若和宗白华最初并不认识,是由于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的。宗白华回忆说:“当时,沫若正在日本留学,他从国外向《学灯》投寄新诗。沫若的诗大胆、奔放,充满火山爆发式的激情,深深地打动了。我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抒情的天才,一个诗的天才,因此对他寄来的诗作很重视,尽量发表,尽管他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③郭沫若自己也说:“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④他第一部诗集《女神》的一些诗篇,便是经宗白华之手在《学灯》上发表的。也正是由于宗白华的介绍,郭沫若认识了田汉。他们三人在通信中谈人生,谈事业,谈哲学,谈诗歌和戏剧,谈婚姻和恋爱,互相倾诉心中的苦闷和不平,彼此鼓励追求美好的理想。后来田汉倡

①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5、66页。

③ 宗白华口述,邵士方、赵尊宪整理:《秋日谈往——回忆同郭沫若、田汉青年时期的友谊》,1980年10月19日《北京日报》。

④ 《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67页。

议把这些信整理出版,这便是蜚声一时的《三叶集》。

追求个性解放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郭沫若和他的朋友,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女神·序诗》中写道: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姐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诗人渴望寻找与自己“振动数相同的人”,“燃烧点相等的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支配下,才有了创造社的成立。

1921年成立的创造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创造社从前期到中期和后期,其成员的人生追求和文艺思想并不尽相同,郭沫若和他们的关系也有深有浅。但是郭沫若作为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和前期的主要成员,对于创造社始终很有感情,这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他和成仿吾、郁达夫三人之间的友谊,更是脍炙人口。郭沫若曾经说:“达夫、仿吾和我,在撑持初期创造社的时候,本如像一尊圆鼎的三只脚。”^① 他们的亲密合作,使创造社以异军崛起的姿态,风靡了中国的文坛。而当郁达夫这只脚离去时,圆鼎子也就只好塌了。从创造社的盛衰中我们不难看出,把这个文学团体的成员维系在一起的纽带,与其说是文艺思想的共同性,不如说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前期创造社的确以浪漫主义为号召,强调表现自我。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无论是郭沫若或其他创造社成员,“并未强求统一于‘划一的主义’,而且同一‘主义’的成员之

^① 《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213页。

间,情况也是各别的”^①。郭沫若说:

我们这个新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

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②

当《创造》季刊刚出版时,由于销路不是很好,郭沫若和郁达夫“感觉着特别的悲哀”。他们夜间曾经在上海四马路一连吃了三家酒店,喝得酩酊大醉,在马路上一喊:“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③可见他们内心是深感寂寞的。而当《创造》季刊打开了销路,创造社颇为红火之后,内部矛盾却又产生了。因为成员之间“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强求相同”,所以创造社从一开始也就潜伏着一些不协调的因素,尽管因友情而结合,难免要出现“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情况。前期田汉因为和成仿吾的误会而离去,中期郁达夫因为对郭沫若、成仿吾的批评有意见和对社中一些“小伙子”不满,终于公开宣布脱离创造社,这些都是势所必然的。

友谊会给人以温暖和力量,但它有时也是一个陷阱。前期创造社靠友谊结合,其成员之间虽然也有一些思想矛盾,但它的小团体主义却常常会掩盖自己内部的矛盾而一致对外,从而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纠纷。这种小团体主义在20年代的文坛上是相当普遍的,只不过创造社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与文学研究会的论战就是一个例子。1921年9月,郁达夫在《时事新报》上刊登《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其中谈到:“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至艺术之新兴气运,毁灭将尽。”随后,郭沫若

① 参看黄淳浩:《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② 《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编辑余谈》,1922年8月25日出版。

③ 《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41页。

在《海外归鸿》中又指责一些批评家“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甚么自然主义啦，甚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①。他们的矛头所向，显然是对着这时在文坛上已有相当影响的文学研究会，因而自然要引起后者的不满。于是就有沈雁冰《〈创造〉给我的印象》的发表，挖苦创造社“说‘介绍’，说‘创造’，本也有两三年了，成绩却很少，大概是人手缺少的缘故。治文艺的尤其少，更是实情”^②。双方的论战延续了一段时间。关于这场笔墨官司，郭沫若后来曾经反思说：“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更具体地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③他还谈到了自己在这场笔墨官司中的心情：“外界的人通有一种错觉，以为我是创造社的‘领袖’，其实像创造社的那一批‘天才’，除掉以友情为联系之外，绝没有任何人能以‘领袖’的资格来统率的。在我自己始终只有牺牲自己的主张去服从友谊，我决不曾以自己的意见来压迫过朋友，我们的朋友中任谁那一位也都是不甘愿受人压迫的。”^④郭沫若所说的这种心情是真实的。他的确从不以创造社的“领袖”自居，但他在创造社中最负盛名，外界把他看成是创造社的头面人物，这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他又是一个很重友情的人，为了友情，经常要拔刀相助，这就给自己添了许多麻烦。

郭沫若与胡适最初的笔战，便是这种哥们义气引起的。他和胡适1921年8月在高梦旦宴请的席上认识。从郭沫若的回忆录和胡适的日记看来，他们见面时大概相互都有一番表示仰慕的客套。这至少说明，彼此并没有留下什么恶感。后来打笔墨官司的起因，是

① 《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1922年5月出版。

② 《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5月11、21日，6月1日。

③ 《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40页。

④ 同上书，第176页。

郁达夫在《创造》创刊号上发表《夕阳楼日记》，批评余家菊由英文重译德国哲学家威铿(R. C. Eucken)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错误。胡适在《努力周报》上以《骂人》为题，指出郁达夫的批评本身译文也有错误，又暗示创造社“拿浅薄无聊的创作来出版”，与“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①。郁达夫挨了骂，很是悲愤，给回到日本的郭沫若写信，说他要跳黄浦江。郭沫若看了胡适的评论后，便也不依，他和成仿吾都撰文回敬，讥刺胡适的翻译错得更厉害，同时指责胡适是以名气压人。后来张东荪、吴稚晖都参加论战支持胡适，而陈西滢和徐志摩则借机指摘郭沫若的译作。本来，译文有误，互相批评不应成为问题，但因为文人相轻，意气用事，乃至借题发挥，互相攻讦，便毫不足取了。这场论战后来是以胡适给郭沫若、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和的信而郭、郁二人也予以友好的回应而结束的。

二、从走出“歧路的彷徨”到 受“革命理智的规范”

1924年是郭沫若思想历程发生转折的一年。这年4月他离开上海再赴日本后，翻译了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他在给成仿吾的信中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非常感谢。”^②他不再追求成为“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文学家，纯粹的艺术家的纯粹”

① 《努力周报·编辑余谈》，1922年9月17日。

② 《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1924年8月9日。《文艺论集续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的思想家”，而要为新社会的诞生“做个产婆的事业”^①。这年11月，他回国参加了孤军社组织的宜兴调查，接触了社会实际。次年，又亲眼目睹了五卅惨案。中国的现实教育了他，使他懂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②。1926年3月，郭沫若离开上海到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同年7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后被委任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投身大革命洪流之后，郭沫若曾“决心想和文学断缘”^③。北伐途中，和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化界人士是李一氓和阳翰笙，他俩这时都已是中共党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曾企图拉拢郭沫若，秘密委任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津贴三百元大洋。郭沫若不但把蒋介石的阴谋密电报告武汉政府的国民党中央，而且在脱离蒋介石之后，公开发表讨蒋的著名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八一南昌起义消息传来后，郭沫若和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四人冒着生命危险，从九江奔赴南昌参加起义部队。同年8月，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郭沫若秘密回到上海。后来他流亡日本，又是李一氓奉周恩来之命与其他同志一起安排的。

大革命的失败，使郭沫若重新续上了文学之缘。在流亡日本之前，郭沫若曾经对创造社的业务和人事作过一些建议。他主张恢复《创造周报》，充实《创造月刊》，发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丛书。在人事方面，发动李一氓和阳翰笙参加，以加强党的力量；同时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鲁迅合作，扩大影响。鲁迅那时也

① 《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1924年8月9日。《文艺论集续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

② 《〈文艺论集〉序》，原载1925年12月《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7号。

③ 《脱离蒋介石以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已由广州回到上海,表示愿意合作。为此曾在报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以鲁迅名字领衔,郭沫若用麦克昂的化名居二。从这些安排可以看出,经过了革命斗争洗礼的郭沫若,已经不再把文艺工作当作是表现自我的工具,而是看成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个计划却受到意外的挫折,因为成仿吾和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等一批创造社的少壮派反对复活《创造周报》,主张“把创造社作为明朗的思想战的基地,要尽力从事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推阐工作”^①;对于和鲁迅合作,也很冷淡。郭沫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深深地知道,假如我要坚持我的主张,照当时的情形看来,创造社便可能分裂。这是我所极不愿意的。”^②郭沫若所说的这种心态,固然反映了他当时的真实思想,但这种心态恰恰表明他还没有完全克服原来那种文人小团体主义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小团体主义现在表现为一种“左”的宗派情绪而已。也正因为如此,他虽然提出要和鲁迅合作,但对鲁迅在革命文学队伍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未能有正确的认识,以至于后来又引发了与鲁迅的龃龉。

当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把鲁迅作为批判的对象时,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虽然也“认为总有点过火”^③,但并未出面制止。而当鲁迅发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用比较尖刻的语言反击创造社成员的批判时,郭沫若又禁不住要为创造社打抱不平了。1928年8月,他以“杜荃”的化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不但批评鲁迅“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还指责鲁迅是“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还不曾确实的把握”的“封建余孽”^④。针对创造社和郭沫若对鲁迅的无理指责,冯雪峰曾正确地指出:鲁迅“至多嘲笑

① ③ 《海涛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篇》第13卷,第308页。

② 同上书,第309页。

④ 《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

了革命文学的运动(他也并没有嘲笑革命文学的本身),嘲笑了追随者中的个人的言动;而一定要说他这就是诋毁革命,‘中伤’革命,这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吗?而且不是可笑的吗?”^①这个批评是很恰当的。郭沫若当时身居国外,对国内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非常错误的文章?除了他的宗派情绪和感情用事在作祟之外,当时国际和国内“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日本,“福本主义”就有相当大的影响。流亡日本的郭沫若,是否受过它的影响,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尽管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是错误的,但平心而论,郭沫若和创造社、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有其重要历史功绩的。他们与鲁迅的论战,“从‘切磋’的观点看来,未尝不是一件有收获的事”^②。这一点,就连鲁迅自己也不否认。他在《三闲集》的序言中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为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也正因为有这个思想基础,所以“左联”成立以后,鲁、郭二人和“左联”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他们两人表现了与先前完全不同的相互尊重的态度。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曾坦诚地说:“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③而郭沫若很快也就写了《菟苗的检阅》作为回应。文中说,他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

① 画室:《革命与智识阶级》,1928年9月25日《无轨列车》创刊号。

②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③ 《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学”这个口号本来是不赞成的,读了鲁迅的文章之后,“我觉得问题是明朗化了,而且我深切地感觉着,鲁迅先生究竟不愧是我们的鲁迅先生”。他还称鲁迅“一向是领导着我们的领袖”^①。在鲁迅逝世之后,郭沫若又写了《民族的杰作》、《不灭的光辉》两篇文章,对自己未能亲聆鲁迅的教诲深感遗憾,称“鲁迅始终是为解放人类而战斗一生的不屈的斗士”,表示要继承鲁迅精神,“鼓起我们的敌忾,前仆后继,继续奋战”^②。

从郭沫若和鲁迅关系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流亡日本的初期尽管还保留着前一时期的那种小团体主义的宗派情绪和“左”倾思想,但他这时毕竟已经是一个加入了组织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团结鲁迅的方针对他的思想和行动不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林林在回忆郭沫若与东京“左联”的联系时说,郭沫若开始对“国防文学”的口号有所犹豫,因为“国是蒋介石在统治着的”。后来认真体会《八一宣言》的中心思想,认识到民族矛盾已超过了阶级矛盾,“他对我表示愿意来做党的喇叭”^③。这使我们想起了周恩来1941年在《我要说的话》中对郭沫若的分析。周恩来指出,郭沫若和鲁迅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鲁迅作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郭沫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他的革命热情的奔放,自然还带着很浓厚的浪漫谛克,这正是当时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但是经过前一次大革命炉火的锻炼,经过十年海外的研究生活,他的革命热情已经受了革命理智的规范,然而他内在的革命烈火,却决没有消失,相反的,愈蕴藏便愈丰富”^④。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革命理智的规范”,郭沫若的思想有了一个飞跃,在处理人

① 《集外》,《郭沫若全集·文学篇》第16卷,第243、244页。

② 同上书,第261页。

③ 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载《悼念郭老》,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④ 《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际关系上,也更多地是从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来考虑问题了。

郭沫若在流亡东京期间,除了对东京“左联”的青年朋友所办的几个刊物给予有力的支持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上。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言中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表明他在埋首于古文字学和古代历史研究时,仍念念不忘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研究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对他来说完全是一项新的学问。在这方面他得益于两个朋友的帮助,一个是日本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另一个是燕京大学教授容庚。郭沫若和容庚原来并不认识,因为读了容著《金文编》之后,对作者“用力之勤,究学之审,成果之卓荦,实深钦佩”,特以“未知友”的名义致信容庚讨论一些古文字的释读。容庚很快就给他回信,从此两人书信来往,商讨学术问题。郭沫若当时在日本苦于资料缺乏,容庚经常给他寄去一些新发现的甲骨文、金文拓片和图书。与容庚的结识对于郭沫若来说还有另一层特殊意义,即使得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国民党官方学界知道了郭沫若的古文字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脱稿后,寄给容庚,后者看过之后,也给其他一些学者传阅。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曾有意把郭沫若的稿子在史语所《集刊》分期发表,以后再由研究院出单行本。但郭沫若因为研究院是官办的,并且傅斯年又提出出版时作者不用郭沫若本名而用化名这种无理要求,就以“近日之官家粟亦雅不愿食”^①为由,给容庚写信婉言谢绝了。

^① 郭沫若1930年2月6日给容庚信,见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三、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 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①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义无反顾地秘密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夏衍、丁玲、老舍、曹禺等45人被推选为理事。郭沫若在为庆祝文协成立所写的《文艺与宣传》中说：“作家们的意见和流派，素来是不易统一的，如今借着抗战的旋风像海啸一样把它们统一了起来，这实在是国家民族的福利，也就是抗战对于国族的一项赐与。”^②在抗日战争初期，除了周作人、张资平等极少数民族败类之外，整个文化界在抗日的旗帜下确实都团结起来了。这个时期，郭沫若交往的文化圈有了很大的扩展。

1938年4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三厅当时聚集了一大批进步的文化人，这里不仅有他的许多老朋友，如田汉、冯乃超、阳翰笙等，还有不少新认识的朋友，如洪深、徐悲鸿、冼星海等。这么多的知名文化人愿意参加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固然是出于大家的爱国热情，但郭沫若的号召力显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文协的成员在政治倾向上左中右都有，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党决定推举老舍主持日常会务。郭沫若积极支持老舍的工作，他曾经在赠送老舍的一首诗中，用真挚的感情表达了对这位新朋友的热爱和敬重：“吾爱舒夫子，文章一代宗。交游肝胆露，富贵马牛风。”^③老舍则说，他原先不认识郭沫若，“以为他是一条猛虎”；认识了他以后，“才知道他是个伏虎罗

① 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197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② 《羽书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第250页。

③ 《赠舒舍予》，《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第203页。

汉”。“他的学问，正和他的生命一样，是要献给社会、国家与世界的。他对人也是如此，虽然不能有求必应，但凡是他所能做到的，无不尽心尽力的去为人帮忙。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那种随时的，真诚而并不正颜厉色的，对朋友们的规劝”^①。郭沫若的这种长者风度，在参加三厅工作的一些文化人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陆万美回忆说：“他对我们演剧队的每个队员，显得那么热诚亲切。无论在走廊上碰见或他有事要找我们，他都先点头招呼，笑得那么真挚，让我们愿意接近他，又从心里崇敬他。他天才焕发的讲话和看演出时的片语只言，时时都使人感到精辟透彻，见解新颖，从中得到智慧和启发。当时的第三厅，团结了大批的文化人，大家都热情百倍地从事工作，心里都以能在郭老领导下从事抗战工作而深感荣幸。”^②

1940年9月，蒋介石下令免去郭沫若第三厅厅长职务，又胁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遭到三厅人员的坚决抵制。蒋介石不得不把三厅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文工会的活动范围受到了很大限制，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文工会经常举办各种讲座，广泛联系党外的文化人士。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中共南方局决定组织一次庆祝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和五十寿辰的活动，显示民主力量的壮大。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下，经过筹划，这次庆祝活动的发起人不仅包括了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章伯钧、罗隆基、王昆仑、屈武等著名民主人士和一批文化界的精英，就连孙科、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等国民党的官方人士也列名其中。11月16日，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大会，由冯玉祥主持。

① 老舍：《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抗战文艺》第7卷第6期，1942年6月。

② 陆万美：《红梅山茶忆郭老》，载《悼念郭老》，三联书店1979年版。